



徐文化对苏轼知徐州时期 思想与创作的影响

王新文 徐炳仁 蒋岚宇



北宋熙宁十年(1077)四月至元丰二年(1079)三月,思想家、政治家、一代文学艺术全才苏轼,作为徐州知州,在徐州生活了一年零十一个月。其间,苏轼领导了一场规模宏大的抗洪抢险运动,确保了徐州城及居民的安全。他在徐州还发现了石炭,为延续至今的开采煤矿奠定了基础。他与分别七年之久的苏辙在徐州畅叙手足之情,度过了百日相聚的美好时光。在徐州,他初识“苏门四学士”和“苏门六君子”中的三位:黄庭坚、秦观及陈师道。他还广泛交游,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诗文,迎来平生第一个文学创作高峰;在思想上,由单纯的儒学思想达到了儒、释、道的高度融合、提升,奠定了一生洒脱、豁达、无我思想境界的坚强基础。同时,其以民为乐、造福于民的人生价值观和忧国济民的从仕观已经形成并臻成熟。知徐州是苏轼人生中的重要时期,以此为标志,苏轼进入人生的重大转折期,思想和创作上都迈上了更高、更新的领域和境界。应该说,徐州的文化氛围对苏轼的影响很大,如果没有徐州特定的文化氛围,也就不会有苏轼在徐州时期思想上的升华,更不会有其文学创作上的重大转折、飞跃,而成为一代文豪。





徐文化的核心内容

宋代徐州属京东西路,南与淮南路接壤。徐州位于苏鲁豫皖四个省会的中心点,与南京、济南、郑州、合肥之间均为三百公里左右的距离。它所构成的接壤带即淮海经济区,方圆面积也与古代禹分天下为九州的徐州的版图大体相同。从人文地理的视角(“大徐州”概念)看徐州,这一带正是中华民族文化发祥地和巅峰地之一。古代徐国在这个区域内历经夏商周存世 1649 年,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,徐人徐偃王首先倡导仁、义、德、礼、信、道,仁义治国。

就是这样的一块地方,它有着自己的固有文化,这就是徐文化。徐文化,它的定义范围应是徐州(包涵广义的古九州之一的徐州)地域文化,是徐地徐人创造的文化,是一个系统的文化工程。

根据研究成果,我们认为徐文化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:

一是仁。“仁”是孔子儒家思想的核心,“仁者,人也。”(《论语》)但在孔子之前,“仁”的思想早已形成。如《淮南子·人间训》就称比孔子早 400 多年的徐偃王是“有道之君也,好行仁义”。徐偃王因“不忍斗其民”在周楚连谋伐徐时,选择了“走之彭城”,回避战争,为的是不丢仁义之旗帜。偃王在临死之前说:“吾赖文德,而不修武备。好行仁义之道,而不知诈人之心,以至于此。”(《徐偃王志》)这里他已经明确他是“仁”者,由于他“好行仁义之道”,“诸侯三十二国尽服矣”,(《说苑》)“四方诸侯之争讼者,不至周而至徐”(《北宋徐氏谱》),由此可知徐国的仁已为天下知,其在四方诸侯中的威望甚至超过了周室王朝。并且从徐偃王起,仁义就传承下来,孔子把它发





扬光大,成为东方文化的核心理念。

二是义。据考,徐人和殷人其实是“老乡”,商王室的殷族先人就是在山东滕县一带繁衍发展起来,然后一路打到中原,几次迁都才到了安阳。徐人的“老乡情结”使其依附于殷人统治有了一定的思想基础,使本来独立的封国成为了殷商的“分族”,史称徐为殷民“六族之一”。(《左传》)尽管殷人对徐人大部分时间还是戒备的,但是徐人仍对殷人讲义气。殷商时期统治者不仅创造了“仁”来满足役使奴隶和其他外族需要,还创造了“义”,让被统治者在“公正和义气”感召下,心甘情愿地接受奴役和宰割。应该说徐国也是这种文化的创造、吸纳和践行者,偃王“好行仁义”,对“上国力尽忠谟”,“生为忠良之臣”(周穆王《敕封徐偃王》文告);对国人则“被服慈惠,身行仁义”(《淮南子》)。

三是德。杨荣国先生认为,从“德”的含义上来说,“德”就是“得”,就是为人做事要做到适宜有度,于人于己都无愧于心,这就是有了“德”。(《中国古代思想史》)周穆王赐封徐偃王的文告中,周穆王就自夸“为崇忠褒烈,必当其人;论德报功,必核其实”。本来徐偃王是被东方诸侯推举出来反对周穆王的,因周穆王西巡,留恋瑶池而忘归,不理朝政,民怨四起。周连楚伐徐,偃王避而不战,走之彭城,周穆王不仅不问罪,反而赐封偃王后代重振徐方。是周穆王大度吗?其实是周穆王迫于民声,偃王有德,不封徐不足以平民怨、顺民意,国难安。韩愈说徐国“处得地中,方德而治”,“以君国子民”。(《衢州徐偃王庙碑》)可见“德”在徐国已被公认为正统思想了。在《徐偃王志》卷二“纪事第一下”里,记述了徐伯关于有道和无道君臣的言论,内有“以怀其德”、“循其祖德”等内容,说明徐国对“德”





的认识已是相当“前卫”的,以至于后世的齐桓公等诸侯纷纷效法。

四是信。“信”和“诚”往往是连在一起的,信则诚,诚则信。《史记·吴太伯世家》说,吴季子在出使上国途中经过徐国时,被徐国待为上宾,“徐君好季札剑,口弗敢言。季札心知之,为使上国,未献。还至徐,徐君已死,于是乃解其宝剑,系之徐君冢树而去。从者曰:‘徐君已死,尚谁予乎?’季子曰:‘不然。始吾心已许之,岂以死倍吾心哉!’”此后,徐人为彰显季子情义、讲求诚信的美德,在徐君墓前修了座挂剑台。此台原来座落在徐州市户部山之西,华佗墓之北,现因规划建设需要,已于2004年秋迁至云龙山西坡。这个故事说明了两点,一是吴季子讲信用,二是徐人讲信用。《新序·节士》载,徐人嘉而歌之曰:“延陵季子兮不忘故,脱千金之剑兮带丘墓。”徐人赞美讲信用的吴季子,是说明信已是他们的行为指南,成为他们文化的一部分。

五是礼。《说文》:“礼,履也。”《释名》:“礼,体也,得其事体也。”由此可知“礼”是规范秩序的行为准则。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重看“礼”,都把“礼”作为维护社会秩序的中心内容和基本手段。一国之“礼”就像现在宪法一样庄严,如“周礼”就被历代统治者吹捧。古徐国的“礼”文化,可以从近代出土的文物看出端倪,如“沅儿钟”铭文,就描述了一家几代老幼有序,和睦相处的情形,是“徐礼”在徐国家庭的体现。

六是道。任继愈先生在《老子新译》一书里说:“‘道’这个范畴是老子先提出来的。”其实,老子之前就有“道”,《诗经》上有“周道如砥”的话,《广韵》说“道”是“理也,众妙皆道也,合三才万物共由者也”,《易经》又说“一阴一阳谓之道”。徐人讲的“道”,多是具体的





道理,如“德行之道”、“有道之君”等。在他们看来,天有道,地有道,人亦有道。“道”虽然大到包涵万物,而万物也是各有“道”的。《管子·四称》里,管子把徐伯关于“有道”、“无道”的言论复述给了齐桓公,“桓公善之”,认为很好,就按徐伯的“有道之君”的要求去做了。徐伯应为徐国的国君,穆王命徐子为伯,夏王命以徐伯主淮夷,徐伯之称是袭旧号。这里徐伯的“四曰”内容已很广泛,有治国大道,也有处世之理,还含有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、忠、孝等,由此可见当时徐国文化之发达。

徐文化对苏轼产生的影响

林语堂说过:“苏轼身上的道德力非人力所扼制。”苏轼的道德力的真正形成期和迸发期可以说是在徐州。也正如林语堂先生所说:“就连苏东坡这样的天才,生命也是从四十岁开始。”苏公来徐,正是生命真正开始的四十岁以后。

中国传统文化结构里儒道释三大体系是其主流,其中“释”是“舶来物”,中国传统文化改造和重释了“释”,“释”在中国扎根,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内容。由于独特的人文地理和传播条件,徐州地域与儒道释三家文化有着不解之缘。苏轼治徐州期间,受徐地儒道释文化的影响,由此而升华了其政治思想,转变了其创作走向。

(一)徐地儒学文化对苏轼思想与创作的影响

在先秦儒学的传播中,徐地是儒学文化的集散地、发源地。

就渊源而论,徐地与邹鲁自古均渊源于东夷文化,徐偃王的“仁、义、德、信、礼、道”是先于孔子的徐淮海地区的源头文化。夏商





周以来,徐文化儒风浓厚,“其民犹有先王遗风,重厚多君子。”春秋时期孔子多次来过徐地。《庄子·达生》载,孔子曾多次率领弟子至徐地考察,到达吕梁山区凤冠山下泗水岸边眺望徐偃王息战地徐山,俯观吕梁洪奇险壮观,看到滚滚奔流不息的泗水,想到往事如烟,人生苦短,不过如浪而逝,感叹不已,因此才有了“逝者如斯夫,不舍昼夜”的千古名句。苏轼常乘舟沿泗水南下到吕梁,作有《答吕梁仲屯田》、《次韵吕梁仲屯田》、《吕梁》等诗词。

西汉徐地位于儒学文化核心文化圈区,系儒学文化发达之地。苏轼在徐地儒学文化的熏陶中,接受了儒学经世济时的传统,奠定了独立的人格。

(二)徐地道家文化对苏轼思想与创作的影响

徐文化是孕育老子道家思想的重要来源,而老子的思想则是影响道家的主体文化。徐、沛等地是老子著书创说,治学授徒之地。老子一生中,除在东周王室做过守藏史外,其余时间主要在徐沛地隐居。《庄子·天运》曰,孔子行年五十有一,而不闻道,乃南之沛,见老聃。老子在37岁时,因度甘禅公道害,辗转至徐沛地隐居和躬耕、授徒、著《道德经》,道家中心随老子行迹东徙徐沛地域。苏轼深受徐地道家思想的影响,所作所为均有所体现。如苏轼和张天骥的交往,就是一段佳话。由于深受徐地道家思想的影响才创作出了千古绝唱《放鹤亭记》。

又如所题李思训画《长江绝岛图》,苏轼画中的小孤山及对岸的彭浪肌与徐州的民间传说有机联系起来,把“小孤”说成“小姑”,把“彭浪”说成“彭郎”,又把他们说成夫妻,诗的最后四句写道:“峨峨两烟鬟,明镜开新妆。舟中贾客莫漫狂,‘小姑’前年嫁‘彭郎’。”





利用徐文化中的传说故事将江中的岛屿拟人化,异想奇思,妙趣横生。

(三)徐地佛教文化对苏轼思想与创作的影响

熙宁十年(1077)十月八日,苏轼兴致勃勃地与苏辙同游云龙山台头寺石经院,各留小诗三首。在徐州相聚百日的苏辙、苏轼于次日便恋恋不舍执手相别于东门外,苏轼难以释怀,作《初别子由》诗;苏辙亦有《次韵子瞻见寄》,感叹少年时的雄图大略已不复存在,兄弟历二任郡守,已华发初生。另一首《初发彭城有感寄子瞻》表达了他对时局的担忧,这时反变法的兄弟很快就尝到政治迫害的滋味,长相厮守一起过田园生活的佛家朴素的愿望再也无法实现。苏轼深刻领悟佛家智慧的特点是站在人生外,用超人的眼界识别人世间的种种假象,揭示人生悲剧的根源,把人们的心灵引度到一个一尘不染像莲花一样的洁净清凉世界——涅槃境界,以后黄州等地的经历证实了他在徐州的思考。

(四)徐地民俗文化对苏轼思想与创作的影响

徐州地区民俗文化的古朴、淳厚、豪放,也是苏轼知徐州时期思想形成的文化土壤;徐州地区盛行的“徐乐”文化氛围,深深地影响了苏轼的思想与创作。

元丰二年(1079)三月,苏轼接到调任湖州的诏命。他在三月二十七日所作的《灵壁张氏园亭记》中写道:“余为彭城二年,乐其风土,将去不忍。而彭城之父老,亦莫余厌也,将买田于泗水之上而老焉。南望灵壁,鸡犬之声相闻,幅巾杖屦,岁时往来于张氏之园,以与其子孙游,将必有日矣。”流露出他对徐地的眷恋和个人的生活理想。徐文化的深邃内涵给予其丰富的诗情灵感,陶冶着思想家





的情怀,为其以后名扬天下,起到了其它文化不可替代的作用。

(本稿由王新文主讲,徐州市社科联推荐)



王新文,高级经营师,注册高级职业经理人。现任徐州师范大学徐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、研究员,徐州师范大学中国哲学与宗教研究所研究员,中华徐文化网专栏作家、主持人,《徐文化研究》杂志副主编,徐州市徐国历史研究会副会长、副秘书长,徐州市苏轼文化研究会理事,徐州民盟徐文化研究院副院长。国家教育部策划与营销专业高校教材编写委员会专家编委,上海理工大学中小银行研究中心研究员,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研究员,中国国际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顾问。发表论文 200 余篇。

